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长编

第三卷 1966-1978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国新 贺耀敏 刘晓 武力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长编

第三卷 1966-1978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国新 贺耀敏 刘晓 武力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 第3卷, 1966~1978 / 刘国新等主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201-06418-5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现代史—1966~1978 IV. ①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4800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32.5印张 5插页

字数: 676千字

定价: 179.00元

## 总编委会

总主编	刘国新 武力	贺耀敏	刘 晓
副总主编	杨凤城 钟真真	齐鹏飞	丁 明
编 委	安建设 张 蒙 何虎生 李松林 彭 卫 林 嘉	傅玉能 罗燕明 毛仲伟 彤新春 于剑波	王树荫 苏 浩 夏 潮 陈思训 朱立南

---

---

# 第 三 卷

(1966 — 1978)



### 第三卷 编委会

**主 编** 刘国新 刘 晓  
**副主编** 武 力 夏 潮 林 嘉 傅玉能  
**作 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仲伟	王 宏	王 进	王 虹	王海光
王爱华	史晓辉	母稷祥	刘小萌	刘占义
刘国新	刘 晓	刘惠君	向 彪	安建设
江秀平	许士荣	何虎生	张 丁	张 丽
张 爽	张 蒙	张碧霞	李丹慧	李松林
李 英	杨凤城	杨 红	杨亲华	沈谦芳
肖艳丽	彤新春	陈东林	林 嘉	武 力
侯京辉	姚 力	胡荣红	贺宏善	赵永承
赵 旭	赵燕华	钟真真	倪晓华	夏 潮
柴观珍	曹希岭	曹 纯	黄 伟	傅玉能
曾卓明	韩 孟	戴晨京		

---

# 前 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与编者共同努力的结晶。

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存史”。至于怎么存?却是有些说道的。

就共和国史而言,以单一的体裁述说历史,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人类社会一旦搭上现代化这趟快车,就不太可能是一个直线的轨迹了,社会的整体性和网络化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联程度都决定了历史面貌的立体化结构。为了能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由“总论”、“重大事件”、“文献资料”、“人物”及“大事记”五部分组成。五个部分既是独立的,又能互为补充。

“总论”,顾名思义,是史论,是说本阶段历史概貌。这部分内容侧

重分析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每个阶段有哪些不同的特点。此外,对主要成就的归纳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总论”的题中之义。在写作方法上,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事引论。在对成败的判断上虽然不可能用太多的笔墨,但也不是浅尝辄止。读者通过“总论”会得到一个总括性的印象。

“重大事件”就是按照中国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的写法,尽可能完整地揭示重要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局。哪些属于“重大事件”呢?首先是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比如“三反”、“五反”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毒运动”;接下来是重要的事件、决策和会议,比如抗美援朝战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再接下来就是治国理念和方略、重要的思想、重要成就,比如“三步走”发展战略、“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等;还有主要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社会习俗、突发公共事件以及重大自然灾害,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防治“非典”、抗震救灾等等。大体说来,前30年因为政治运动较多,一个事件基本上就是一次运动,比较容易独立成篇;后30年国家各项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不再搞运动,所以,“事件”更多的是表现为某个领域的发展、某项政策的贯彻、某一方略的提出。不管是政治运动也好,还是发展方略也罢,它们都是历史的关节点,点点相连,就组成共和国历史的脉络主线。我们在这部分里面还安排了“港澳台”专题,对于1997年前的香港和1999年前的澳门,为了照顾历史的完整性,也作了简单的引述性记载。在编排上,依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几大板块排列,每个板块内按时间的先后为序。

“人物”吸收了传统史学纪传体的长处,简述人物的经历。传主为在共和国创立、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建功立业的人物,也适当地收录了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这里有两个具体的标准,首先是已经去世的,仍然健在的不收。其次是凡党政军系统人物一般按正部级以上出条,其他方面如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学术界的人物则以其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为依据,这里面虽然很难定出一个明确的标准,但从约定俗成或公众认可的角度看,还是能够画出一个杠杠的。人

物按姓氏音序排列。

“大事记”是学习传统史学编年史体例,以年、月、日为经,以事件为纬。在遵守通常的编写大事记体例的基础上,本书还有自己的考虑。其一,从史学定位看,本书的“大事记”是中观史学,甚至包括一点点微观事件。因为以全书的互补关系,“重大事件”主要反映宏观史学,那么,“大事记”定位于中观带点微观就是恰如其分的,这充分体现本书各个部分所代表的不同层次。其二,从收录的领域看,“大事记”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以外,还有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学术、卫生、体育、民族、宗教、国土、人口、气象等林林总总的事,它编织的是一幅更为细密的网络。“大事记”有部分内容同“重大事件”相重复,本书的处理办法是,凡“重大事件”已有的,“大事记”一概从简。

“文献资料”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组织沿革和职官,以及研究成果总目。

本书的九卷分别是“重大事件”六卷:第一卷(1949—1956)、第二卷(1956—1966)、第三卷(1966—1978)、第四卷(1978—1991)、第五卷(1992—2002)、第六卷(2002—2009)。这种分法,不是本书的独创,完全是参照近些年学术界,包括党史学界和国史学界关于阶段的划分法,同时也自觉这六卷的编排无论从其所呈现出来明显的阶段性,还是从国



家最高层级的对应上也还说得过去。第七卷为“人物”卷，第八卷和第九卷为“大事记”卷。

粗粗算来，国内对于共和国史研究有近30年了，出版著作百十来部，时间和数量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志，还很难说，因为绝大多数著作都是教材。我们认为，共和国史若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按史书范式写出一批论著是基本条件。本书不敢妄谈水平多

高，但宽领域、多视角的记述，多多少少还是做到了存史的目的。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写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应了孔子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和刘知几所强调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要求。如果条件允许，本书每隔10年重新补充修订一次，长此下去，也会成为一个可观的文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  
(第三卷 1966—1978)

# 目 录

<b>总论</b>	····· (112)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 (1)	中苏边界谈判 ····· (117)
<b>重大事件</b>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上)
“文化大革命”的酝酿与导火索	····· (123)
····· (24)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下)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再发动	····· (130)
····· (31)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 (138)
红卫兵运动 ····· (40)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 (148)
从“一月夺权”到“全面内战” ····· (58)	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批判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周恩来 ····· (65)	极“左”思潮的斗争 ····· (155)
控制混乱局势的努力 ····· (77)	打开外交新局面 ····· (16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 (80)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斗、批、改”运动 ····· (94)	····· (171)
周恩来与“抓革命、促生产” ····· (103)	“批林批孔”运动 ····· (177)
纠正“文革”初期外交工作的偏差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185)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领导

全面整顿 .....	(189)	“文革”时期国家教育事业的破坏 及纠“左”斗争 .....	(320)
“四五运动” .....	(209)	“文革”期间的科技事业 .....	(330)
粉碎“四人帮” .....	(215)	“文革”时期军队建设的曲折历程 .....	(340)
第三个五年计划 .....	(237)	文艺战线的浩劫与斗争 .....	(350)
第四个五年计划 .....	(246)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 ...	(358)
中央精简与地方扩权 .....	(254)	拨乱反正取得突破性进展 .....	(368)
工业的整顿与发展 .....	(262)	真理标准大讨论 .....	(383)
“农业学大寨” .....	(267)	港澳台地区概况 .....	(399)
三线建设 .....	(276)	<b>附录</b>	
对外经济交往 .....	(284)	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各级组织沿革和领导成员名录 .....	(425)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短期波动 .....	(287)	国史研究论著索引 .....	(477)
第五个五年计划 .....	(295)		
“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村合作医疗 .....	(304)		

# 总 论

##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即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十年中,国家建设事业遭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既不是文化革命,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 一

####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错误,其发生有着深刻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依据,集中反映在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这些文件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

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等等。这些错误论点都源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道路和资产阶级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这是自1957年以来提出并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错误理论积累的结果。

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到1966年春,全国约占1/3的县、社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少数城市约占3.6%的国营工业交通系统开展了“五反”运动。由于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毛泽东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认为农村基层单位有1/3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中,“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已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错误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4年10月以后,许多基层单位进行了“夺权”斗争。12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与此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中央各部门、各地方以至中央领导核心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批评中共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

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1965年10月,他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他甚至担心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并为此采取了防范部署。1965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错误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认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又为什么把“中央出修正主义”作为现实危险提到全党全国面前呢?这是由于:

第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有相当一部分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毛泽东自信他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既有马列主义的某些论点作为理论基础,又有他自身在民主革命中的亲身经历作为历史依据,还有渴望人人都能平等生活的亿万农民为群众基础。加之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直站在正确方面,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宿愿,又在短短几年内大踏步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壮举。巨大的胜利滋长起骄傲情绪,认为他所坚

持的都是马列主义的，而与他不同的意见，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超越现实生产力水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实践总要引起党内和社会上的反对或不同程度的抵制，对此，毛泽东总是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释问题和处理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体制上的弊端也进一步暴露出来。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中，虽然也提出了一些符合客观规律的重要原则，如工农业同时并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等，但也提出了一些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脱离中国实际的主张，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重视不够，企图单凭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就能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而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用“一大二公”概括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大二公”又导致“共产风”。虽然毛泽东最早纠正“共产风”，但他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强调变革，不强调稳定，强调提高公有化程度。直到他的晚年，还运用列宁的话来论证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多次对包产到户的批判，证明毛泽东是把任何条件下的个体经营都当做社会主义的对立物。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纯粹又纯粹”的社会主义。在分配制度上，毛泽东依然留恋战争年代的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在他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

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的鼓励”，“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很大意义”。这里，毛泽东既忽视了在战争年代，人们的革命精神中已经包含着追求人民的根本的物质利益而不是脱离了物质利益，又忽视了在战争时期与和平建设时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应有不同的方针和方法。1958年，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直至他的晚年仍然坚持这一主张。他认为一些人工工资高了，就会脱离群众，逐渐蜕化变质。1974年12月，他在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姚文元之流把他的的话加以引申，便得出了体现在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一个温床”。毛泽东认为人们的革命积极性可以脱离个人物质利益的动因。他在1960年读苏联第三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多次批判物质利益原则。他说：“这本书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是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这样地宣传物质利益，资本主义成了不可战胜的了”。他把关心群众物质利益与政治思想工作完全对立起来，而又把它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他认为关心个人物质利益，“只会带来个人主义的危险”。似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都应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只知贡献，不问报酬。因而，对于该书中“社会主义的生产的目的一一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熟练劳动力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了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区别逐渐消失”，这样正确的观点也要进行批判。然而，他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传统观点又坚信不疑，如认为个体经营（不管是在什么条件下）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自由市场都是资本主义的土壤；价值规律不能作为计划工作的依据，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这些观点，使他把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央第一线领导所采取的若干经济调整和改革措施，错误地当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从而对中央第一线的领导越来越不满。总之，毛泽东所理解和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蓝图，一是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人人都为公共利益而劳动，不计较劳动报酬；三是人人过着大致相等的生活，差别很小；四是各地区在经济上能自成体系，自给自足。显然，这样的社会主义同当时中国的实际是不相符合的。

毛泽东为实现他所想象的社会主义，还提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主要是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他根据自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认为用政治挂帅，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方法，既然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打碎旧世界，就一定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建设一个新世界。他认为，只要实行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有有一个大跃进的速度。他重视政治的动员作用，却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他重视普通工农的作用，却轻视科学技术专家。他这时的政治挂帅，常常是用错误的或过火的阶级斗争方式来实现的。

第二，错误地将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到国内党内，并将反修防修作为头等大事。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苏两党发生论战，中国在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斗争的同时，对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状况

的分析也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正在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在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严重的历史教训。基于这样的认识，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就把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斗争，作为全党的重大课题。1963 年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质就是以反修防修为纲。人们错误地认为，既然苏联的社会主义江山已经改变了颜色，苏联人民几十年奋斗的成果已经丧失，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把反修防修作为头等大事吗？反修防修的口号，毫无阻碍地得到全党的赞同。由此可见，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对国内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没有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就不可能提出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的任务，“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之所以能得到一些人的拥护，即使有怀疑和抵触情绪的人，也表示要努力紧跟，加深理解，就是因为它是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开展的。毛泽东之所以要始终不渝地维护“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他认为发动这场“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着重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其中一个突出的论点，是夸大社会主义国家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夸大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夸大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而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文章在列举了苏联的工厂、农村和国家机关中某些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倒把活动之后，武

断地认定：“在苏联，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部门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级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既然苏联资本主义正在复辟，那么毛泽东号召“反修防修”，在人们看来，自然是完全正确的了。

第三，1961年以后，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和毛泽东的意见分歧，被错误地当做修正主义与马列主义的斗争。如果仅仅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还不会导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有两个独立王国，即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为代表的政治局的多数，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书记处，是两个独立王国。他认为，要解决这两个独立王国，用通常的方法，即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本人是少数，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最直接的原因。在以往的一个长时期内，中共中央很少有重大的意见分歧。工作中的不同见解，通过认真讨论很容易求得统一。因此中共中央是紧密团结的，在发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中共中央在认识上都是一致的。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党内的分歧开始于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切实纠正“左”的错误。一场“反右倾”斗争却使彭德怀等人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打击。1961年初召

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的许多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使更多的领导人对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利弊得失，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然而中央第一线的一些领导人的见解，却不为毛泽东所接受，相反，毛泽东认为他们对“三面红旗”产生了动摇，属于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的表现。

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困难时期形势的估计，二是为克服困难应采取何种措施。

毛泽东认为必须充分肯定“大跃进”运动的成绩，对困难估计得严重了会使人民群众丧失信心。他多次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他认为缺点讲多了就会给干部和群众泼冷水。他指责那些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困难的同志是刮“黑暗风”。1961年以后，由于深入第一线掌握了真实情况，对于“大跃进”运动的认识，刘少奇等人同毛泽东的分歧就逐渐明朗化了。刘少奇在他家乡宁乡县炭子冲回答当地干部和农民的问题时，明确指出，近几年生产和生活下降的原因，主要的不是天灾，“主要是这里的工作犯了错误”，而这种错误，又主要不能怪基层，“上边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有一部分责任”，“根子还在中央”。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对造成困难的原因，作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正确判断。指出，“在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显然是在纠正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两



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他要求全党对于承认缺点和错误,不要“枝枝节节、吞吞吐吐”,而要“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篋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不然的话,“经验就无从总结”。<sup>①</sup>当陈云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有巨大赤字,全党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严重困难估计不足,而要求作大的调整时,刘少奇大力支持陈云的意见。在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要求全党要充分估计困难。他指出:“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时,刘少奇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刘少奇的这些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上述分析是右倾的估计,是对“三面红旗”的动摇。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时承认,他从1962年开始,就想从政治上把刘少奇搞掉。

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是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措施。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刮了两股右倾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带有资本主义复辟的性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通过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为克服困难,采取了

一系列的正确措施。他提议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采纳了陈云提出的许多果断措施。在分配问题上,刘少奇强调按劳付酬。他说:“不要随便说计件工资是落后的。”在流通领域,他强调等价交换,指出“国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调拨,也要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不懂政治经济学是要垮台的”。在政府管理企业的方式上,他强调用经济办法,反对单纯用行政办法,他说:“我们现在的办法是省市的厅局、中央各部都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企业要搞经济核算。组织企业公司,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按经济办法管理,按等价交换、经济法则来办事”。刘少奇实际上提出了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毛泽东却认为“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认为,只有把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推广到工业部门,才能保证建设任务的完成。他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几年了”,不这样做,就“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他认为,把物质利益原则提到首位,就会产生资本主义。

分歧还表现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当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下达后,周扬在1964年1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实际上不同意对文艺战线成绩基本否定,刘少奇当即表示:“我看周扬同志讲的情况和意见都很好”,并针对“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的指责,指出:“剧目,凡是无害的都容许演。”“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京戏,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不

<sup>①</sup>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2页。